

古代河北书院办学特色探析

吴洪成,周旋

(河北大学 教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摘要: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从唐代产生到清代终结,对我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人才的培养曾起过推动作用。古代河北书院有延请名师教学的传统;而招生对象则由最初的宽松随意转变为有资格水平与地域范围的要求;书院的师生关系融洽,形成师生平等、教学相长,学术自由、注重研讨的特点。这些办学优秀传统可以为当今学校教学活动有效性的提升,尤其是师生关系的塑造提供借鉴。

关键词:古代;河北书院;教师;学生;师生关系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6)05-0071-08

书院是我国古代社会一种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同时也是古代文化教育宝库中一块独具特色的瑰宝。教学与研究合为一体,相对于官学体制而言,书院具备不同程度的民间性学术研究和教育机构的成分及特色。书院教育的存在,使得封建官学僵化教条的应试教育模式得以调整,其教学经验的丰富性和办学方式的灵活性,为历代教育家所借鉴。书院对于我国古代教育、学术文化的发展以及人才的培养选拔产生过深刻影响,甚至在当今世界教育发展史上也独具特色。书院名称的出现最早应始于唐代,最初的书院是一种官方性质的文献研究和管理机构,其基本职能是为朝廷贮藏、校对图书,并备为顾问,同时兼有官学或宫廷教育的某些因素。著名的如唐贞元年间(785—805年),李渤隐居读书于庐山五老峰下白鹿洞。南唐时,在白鹿洞遗址置学田建学馆,并授生徒。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唐代除了官方主持的书院之外,也出现了私人创建的书院。这些私人创建的书院部分已经开始具有个人读书治学与授徒讲学的职能,但是讲学活动的规模较小,尚不普遍,而且暂时还没有形成定制。北宋出现白鹿、石鼓(一说睢阳)、嵩阳、岳麓、应天府、茅山等六大书院,形成制度化办学格局。其时书院创办主体方式融合唐末五代,或私人或官府,主要是聘请当时有名的学者大儒讲学其间,教学采用个别钻研、互相问答、聚众讲解等相互结合的方法,以研究学习儒家经典书籍为主,辅以议论时政之内容。北宋之初,书院呈现出繁荣兴旺的发展状态。以后,经过历次的兴学运动和宋代州县官学的日益普及,北宋中期书院也因此逐渐沉寂下去。进入南宋,书院又呈现出振兴的势头,并在宋理宗朝时(1201—1264年)达到了鼎盛,迎来了继宋初之后宋代书院快速发展的又一春天。南宋的书院复兴运动,使得书院成为

收稿日期:2016-06-08

基金项目:河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河北古代高等教育史研究——以书院教育为中心”(SD132004)

作者简介:吴洪成(1963-),男,浙江金华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教育史专业和教育学原理专业研究。

一种新的教学组织形式,其自身的体制也日益完备,功能更加全面,书院教育在南宋达到了成熟阶段。书院是藏书、育人、祭祀圣哲与学术研讨辩论、自由讲学之场所。元代的各路、州、府多有加以沿袭而设之者。明清两代书院尤盛,但其学术思想日薄,成为科举考试准备之场所,尤其是在清代,由于所处时代的历史局限性,书院和科举考试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书院的官学化此时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导致书院的教学内容和教学体制不断僵化,进而不得不对其进行改制,自1901—1906年间清末“新政”新教育制度建立后,改书院为学堂,成为学制体系中的一部分。自从唐代满城(今属保定市辖区)抱阳山出现张说书院以后,河北书院发展演变与全国一样,经历了产生、发展、兴盛及衰落的过程。

河北古代书院从唐代产生直到20世纪初的消亡,期间共持续1000多年的时间,在此期间书院满足了区域社会对于教育和人才培养的需求,对学术思想的兴起和传播起了重要作用,也为后世教育和学术的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宝贵资源,书院因此而成为古代河北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诸多方面深刻影响着河北各类学校的教育实践。古代河北书院教育及文化管理中形成的办学特色对当代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一、延请名师讲学

优质的师资条件是提供优质教育的保证,古代河北书院有延请名师讲学的传统。依据现代教育理论,决定一所学校办学效果与教学质量的核心要素有三个:教师、学生以及教育资源。其中教师教学能力、专业素质以及教育智慧深刻体现了教育力量在组织、引导学生学习以及发展过程中重要的价值与功用,是教育性活动呈现出干预、塑造必要性的本质喻意。就总体而言,具有社会影响或学术水平较高的书院教师,即便不是同时代的博学大儒,也必定是一方的圣贤之士,他们学识渊博,饱览诗书,于谈笑间讲学论道,并且品质高贵,热心于教育事业,颇有大师之风范。

张说书院、西谿书院、棠荫书院是唐代河北最早的三所书院。张说书院又被称为张相公堂,坐落于满城县抱阳山中,武则天永昌元年(689)由唐代名相张说所建,为其读书藏修之所。张说(667—730年),字道济,又字说之。原籍范阳(今属河北涿州),世居河东(今属山西永济),徙家洛阳(今属河南洛阳)。弱冠便应诏对策及第,曾官任太子校书、右羽林将、尚书左丞相、集贤院学士等。唐玄宗在位期间,张说曾先后三次为相,掌文学之任凡30年,为开元前期一代文宗,品评文苑,奖掖后进,深孚众望。他为文俊丽,用思精密,多特承帝旨撰述政论文稿,尤长于碑文墓志。有文集30卷,今通行武英殿聚珍本《张燕公集》25卷、《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丁酉本《张说文集》25卷。张说能写小说,相传《虬髯客传》为其所作,但无确证^[184]。西谿书院,位于封龙山龙首峰的西侧(今属石家庄元氏县与鹿泉市交界)。封龙山是南北走向的太行山支脉,东西绵延11公里,南北10公里,西依太行,东望平原,宛若欲飞向天空的巨龙,因此俗称飞龙山,是有着2000余年历史的文化名山。封龙山自古以来文化教育事业发达,最早对其进行记载的史料可追溯到东汉建武十七年(41),学者伏恭迁任常山郡(今属正定县)太守,敦修学校。当时的学者李躬随即在封龙山授徒讲学。到唐代,西谿书院为“唐隐士姚敬栖遁之所”。

理学在两宋时期完成了从萌芽状态走向成熟的过程,宋代书院的发展与理学的勃兴也是密不可分的。宋代理学主要可以划分为濂、洛、关、闽四大学派,其中的关学就是以河北张子书院的创建者张载为代表人物,张子书院位于今保定安国市境内(旧时称作蒲阴县)。其历史缘由在于张载于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赴汴京(今河南开封)应考,中进士,科举及第之后,被派往祁州(今河北安国市)任司法参军,于祁州城东北角辟馆讲学,“启群蒙于旭日”,时人称为张子书院。张载(1020—1077年),字子厚,凤翔郿县(今属陕西省眉县)横渠镇人,时人称横渠先生。张载是北宋时期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理学创始人之一,他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气一元论的哲学体系,为朴素唯物主义哲学开辟了发展的新阶段。张载的哲学思想对于宋代哲学史和关中思想文化史的发展作出突出贡献。另有

宋初著名文学家李昉、宋末理学学者张著分别在封龙书院和元氏县西溪书院(在原西谿书院基础上重修)任教。尤其是在张著任教期间,他亲自主持书院,进行组织管理,讲学育才,是书院管理以及书院师资选聘中以名家声望卓著者和德才兼备的有道者作为目标追求的一个典型案例。正是由于众多不孚众望名流学者主持或参与书院教育实践,才使得宋代河北书院办学质量得以有效保障,并赢得了社会广泛而持久的声誉。

元朝河北书院的兴盛与理学学派由南向北迁徙流变相关。元代推行“汉化”的文教政策,提倡尊孔崇儒,施文德之政,行礼义之教。因此,元代河北书院的师资主要来自于同时代的理学宗师,在传道授业的过程中理学家的教学理念与教学方法也得到充分体现,比如格物致知、即物穷理、学无常师、读书的有序性、讨论的质疑精神以及对师生情感的培植等诸多方面。四大元曲家之一的白朴、元杂剧家李文蔚、社会名士王仲常等人都曾在封龙书院求学问道,并且他们都是同时期河北西路真定府(今石家庄市正定区)的名士。史天泽之子史杠和史杞,官至廉访使的荆幼纪、集贤学士焦养直、宣抚崔莱等社会名流也都曾求学于此。封龙书院遂有“学徒益众”的记载,常常能够“聚徒数千人,朝暮讲诵不辍”,“四方负笈来学者,如坐春风”,封龙山中有一景,名曰“书院春风”。李冶主持封龙书院时,史称“龙山三老”的李冶、元好问、张德辉等一批著名学者的讲学活动,极大地推动了学术思想的交流与发展。李冶(1192—1279年),原名李治,字仁卿,号敬斋,金元之际河北西路真定栾城(今石家庄市栾城区)人,著名的数学家。金大正七年(1230)以词赋登进士第,授均州(今属河南禹县)知事。晚年居元氏封龙山,买田封龙山下,潜心治学,主讲书院,诲人不倦。为了能够接纳更多的学子前来求学,李冶在乡民及好友等人帮助支持下,修整李昉讲堂,重振封龙书院。元好问(1190—1257年)是金元之际著名的文学家、学者和教育家,秀荣(今属山西忻州)人,字裕之,晚号遗山,北魏拓跋氏后人。幼年在父亲元德明指导下熟读诗文,遂有“神童”之美誉,晚年以著作自任。作为一位教育家,元好问有丰富的教育活动,一生培养众多生徒,并形成较为丰富的教育思想。张德辉(1195—1274年),元太原交城(今属山西)人,字耀卿,号颐斋。金末为御史台掾。金亡之后被聘为经历官,后升参议。以刘秉中为代表的“紫金山学派”在邢台紫金山书院讲学,书院培养的弟子中以“紫金山五杰”之一的郭守敬影响最为深远。郭守敬(1231—1316年),字若思,邢台县人,元代著名的天文学家、数学家、水利专家和仪表制造家,曾任都水监、太史院同知。他组织规模庞大的天文测量,创建登封观星台、大都司天台,制定了《授时历》,他还最早提出并运用三次内插法和球面三角法的计算公式,规定的回归年时间和现在世界通用的公历计算数值完全一样。此外,元代理学大师苏天爵、安熙、虞集在位于今石家庄市新乐县的滋溪书院讲学。其中代表性人物苏天爵,是元代国子监的监生,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字伯修,河北西路真定府人,人称滋溪先生,历任大都路蓟州判官、翰林国史院典籍官大都路总管等职。正是这些名儒大师或著名学者的莅临讲学,诲人不倦,培育英才,才使得书院产生的教育影响明显增大。

明清两代,河北书院发展到鼎盛时期,数量增多,并且出现官学化倾向。这一时期的河北书院,无论是官办还是民办,都以聘请名师为书院要务,以此来吸引更多生源,提高书院的社会地位和声誉。明代位于安州城(今保定安国市)东北角、由元代观光书院演变而来的正学书院,曾由正德年间(1506—1521)任翰林院编修的湛若水主持讲学^{[2]860}。湛若水是明代的学者、教育家。字元明,号甘泉,增城(今属广东省广州增城市)人,孝宗弘治年间(1488—1505年)进士,选为庶吉士擢编修,世宗嘉靖初担任南京国子监祭酒,后官至史、礼、兵部尚书。保定安国的贞文书院曾聘请河南汝阳儒学大儒任淮主持,并且延揽名师周良寅等7人讲学,时有境内生源77人,外州县求学者92人^{[3]714}。曾任湖广右布政使的冯时雍创建了沧州泊头的董子书院,他是明嘉靖十六年(1537)进士,自任董子书院山长主持院务管理并讲学。其间,该书院又聘巡抚都御使周公金、巡按御史朱公裳做主讲^{[4]535}。监察御史蔡璠,字天章,号汶滨,河北宁晋人,曾师从湛若水。他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在邢台宁晋县城外文桥东汶水之滨创建汶滨书

院,并且躬身其间,在院中执教,时有生徒三百余人^[527]。

清代保定莲池书院作为直隶省最高文化教育机构,倍受地方统治者重视,乾隆皇帝曾先后三次莅临书院视察,并钦赐“绪式濂溪”匾额,多次赋诗以勉励师生,大儒名士也纷纷以主讲莲池书院为荣。莲池书院因而闻名于全国,这与其历任名师在此讲学是密不可分的。清代乾隆初年名师孙嘉淦、鲁之裕、尹会一和夏文澜四人在莲池书院任教。其中尹会一身为清朝官吏,雍正年间(1723—1735年)中进士,历任吏部主事、扬州知府、河南巡抚、江苏学政等职。这阶段的名师大多是理学大师,“相与讲学,称为极盛”^[652]。乾隆后期莲池书院的名师有汪师韩和章学诚等人。汪师韩,字抒怀,号韩门,浙江钱塘(今属浙江杭州)人。其年少时就工诗善文,名闻四方,雍正十一年(1733)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客游畿辅,直隶总督方观承延请主讲于莲池书院。这一阶段的名师以考据及经世致用学派为主,这一现象与乾嘉学派风行并获得青睐有关。嘉庆年间(1796—1820年)名师主要有邵瑛、祁韵士等人。咸同年间(1851—1874年)的名师有黄彭年、何秋涛、王振纲等人。光绪时期(1875—1909年)的名师有张裕钊、吴汝纶等。吴汝纶,字挚甫,一字挚父,安徽桐城(今安徽省枞阳县会官乡老桥村吴牛庄)人,晚清文学家、教育家。同治四年(1865)中进士,授内阁中书。曾先后任曾国藩、李鸿章幕僚及深州、冀州知州,长期任莲池书院山长,兼主讲,晚年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并创办安徽桐城学堂。这些名师任保定莲池书院主讲,不仅吸引了大量生源,而且提高了书院的社会地位和声誉。

清代石家庄灵寿县松阳书院由明代万历四年(1576)所建的敬业书院扩建而成,书院经历明清两代,与县学相辅相成,为诸生的学习提供良好的条件。尤其是在清朝康熙中期以后,很多知县、学官受到书院创办者勤政重教而被人称赞的影响,常去书院主讲授业,县内的一些饱学之士也前往书院讲学,书院的开办为发展县域教育起到表率作用。石家庄行唐县龙泉书院由知县张振义于清乾隆二年(1737)始建于行唐城东北隅,知县选聘饱学之士充任山长,山长亲自授学,同时礼聘有声望儒士讲课,山长和教师共同管理生童^[71554-555]。正是由于硕学文士被延请到书院讲学才使得书院办学效率显著,教学质量提高。

无论是创建张说书院的张说,还是关学学派的创始人张载,以及元好问、湛若水、章学诚等人,他们都是所处时代的名师大儒,名师主持或参与教育活动为河北书院的发展提供了优秀的师资,形成书院办学优良传统,为区域社会文明的进步、优秀人才的培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广纳乡里学子

唐代河北书院处于萌芽阶段,是学者私人读书自修之所,尚不具备现代意义上的教学功能,并且由于年代久远所带来的资料限制,学生情况无从考察。宋代河北书院的发展水平相对于全国来说还是偏低,仅有5所书院。此时的封龙山中的封龙书院、中溪书院、西溪书院因为有李昉、张蟠叟、张著等名师在此中讲学,吸引了众多学子前往读书求学。中溪书院是由宋初名相著名历史家、文学家李昉建立,至北宋时“山长张蟠叟诸人相继聚徒常百人”,是当时河北规模最大的书院,在河北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8142]。当时学者众多,生徒相应也不会少,在“学者甚众”的记载之中,可以推断出当时中溪书院盛极一时之状况。

元朝政府不仅在政策上创设书院,而且实际上也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支持书院的发展。如明确规定:书院肄业的学生与地方官学学生享受同等待遇。“自京学及州县学以及书院,凡生徒之肄业于是者,守令举荐之,台宪考核之,或用为教官,或取为吏属,往往人才辈出矣”^[912032]。在这一政策的鼓励之下,越来越多的学生进入书院求学。以封龙书院为例,因为有名师讲学的吸引,封龙书院“学徒益众”,常常“聚徒数千人,朝暮讲诵不辍”,“四方负笈来学者,如坐春风”。但这一时期,河北书院多属民办书院,有地域性办学特点。学生多是书院所在地乡里弟子,且对学生入学资质除了有必备知识基础及能

力素质外,并没有特别要求。元朝政府为了稳定人心,允许学生自愿择师或者于父兄处就学,不愿意到官学中任教的儒士可以选择在书院从事讲学。深泽县乐善书院“延名师以教子弟及四方来学者”^[10]。新乐县壁里书院主讲者苏天爵在《新乐县壁里书院记》称该书院办学效果显著,以至“乡邻从学者众,黉舍至不能容”^{[11]498}。张家口蔚县暖泉书院由本地乡贤、元惠宗至正年(1341—1370年)任工部尚书的王敏创办。他一生勤勉好学,为了培育家乡人才,并希望他们在科举考试中夺得魁星,而有此兴学之举。元大德元年(1297)在国子助教张云襄赞下,邯郸市邱县安仁书院由广平路总管司千户镇抚耿渊之子耿仁并耆宿刘聚等12人倾资建设。翰林侍诏王公儒《安仁书院记略》称:“请师儒教诲居民子弟,明伦善俗,风动一乡。”^{[12]373-374} 廊坊霸县(今霸州市)益津书院“招收附近韩、谢两村子弟肄业其中,设庙祭祀先圣先贤,令学子春秋旦望拜谒”^{[13]12}。之后文风渐盛,在霸州颇有名望,越来越多的学子慕名前来求学。

明代书院已经出现显著官学化态势,官府对所辖区域书院的招生进行严格管理。此期河北书院在数量增加、规模扩大的同时,其官学化程度也急剧提高。官办书院的生源与元代相似,一般都是来源于本府、州、县所管辖的范围之内,而官办书院之外的民办书院也是以本地生源为主。各地书院历史文献对此所作的相关记录很多,此处不赘。当然,偶尔也会有外籍学生来书院就学的情形发生,如当时保定安国市的贞文书院就有境内生员77人,外州县求学者92人^{[3]74}。保定蠡县阳春书院,遴士之绩学有志者肄业其中,为此而专门捐置西城大堤学田10亩,又设公田50亩,供书院诸生肄业^{[14]168-169}。邯郸大名县的元城书院,嘉靖、隆庆、万历年间(1522—1572年)屡有修葺,选12县诸生之俊秀者肄业其中,时课月会,名硕翩翩。明代河北书院特色在于提倡士子立志救世的精神,关心时政,反映舆论,讽议朝政,并以东林书院的学风为导向。

清代书院官学化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书院与科举考试之间的联系甚为密切,书院招生同样有地域和身份的限制。清代许多书院倾向于招收地方官学中的肄业生。以此而论,书院是作为当时官学的辅助机构而存在的。肄业的生童总体可以分成正课生童与附课生童两大类。正课生童又可划分为内课和外课生童两类,是一种正常存在的形式。清代书院的招生不仅对学生的身份有所限制,而且对地域也有要求。一般而言,省会书院的招生范围覆盖全省,以此类推,府、州、县类型的书院招收生源一般都在本府、州、县之内。为了使本地区有限的教育资源得到保护,达到为本地区学生服务的目的,采取教育的地方保护主义政策,明确规定外地士子不得冒籍前来当地入学。保定莲池书院的办学条件及教育规程较之同时期其他类型的书院是比较完备的,按照规定定于每年的正月招生,以直隶全省十一府六州地方官学品行兼优的生源作为士子,和其他一般书院不同,它的招生对象只限于招收生员和秀才,这些生员均是由省内的各府、州、县选送,之后再由莲池书院组织考试,成绩合格者最终须得到省级教育长官省学政的批准,才可以成为书院的学生。这种严格选拔生源的做法,对于提高书院入学生徒的质量是非常有利的。虽然莲池书院发展到后期打破了地域的限制,招收寄居在本地的外省学生,并给予同样的奖励和待遇,甚至在招生范围上打破了国家的界限,招收日本留清学生,淡化了教育的国别差异,但是,那是由莲池书院是直隶总督李卫依照雍正皇帝谕令而建,并作为当时京畿最高学府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相对于莲池书院而言,河北其他书院对于生源的身份和地域的限制仍然是相当严格的。

始建于明嘉靖十三年(1534)的今石家庄市藁城区溇南书院位于县治东北隅(现藁城中学处)。光绪十七年(1891)由藁城县知事文濂就兴国寺旷地劝捐建置,并邀请名师讲学其中。书院招收时对生源有身份的限制,只有地方官吏和富家子弟方可入学,而贫民庶子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15]164}。定州市定武书院于清乾隆戊午(1738)由州牧姚立德创修,州牧沈鸣皋继修。书院录取生徒时,将生员、童生、监生分开录取,并对各自的正课、附课生定额。定武书院的《新议经理章程》规定:“肄业生童每月官课斋课

各一次,俱赴院作课,现因经费不敷,生员先行酌取超等十名、特等十五名。童生先行酌取上卷五名、中卷十名,俟经费宽余再行增加,膏火多寡因时酌定,随课发给,官课奖赏由官捐发,斋课由公项支发。”^[16]书院在招收生徒时,给予生员、监生的名额明显多于童生。由此可见,书院在招生时对学生出身及学业程度有严格的限制。

三、师生教学相长

1. 尊师爱生,关系融洽

我国古代一直有尊师重教的传统。古代河北书院的师生关系十分亲密,老师关心爱护学生,学生尊敬老师。古代河北书院学生对老师的尊敬,充分体现在崇祀圣哲乡贤仪式及活动中。崇祀即崇拜祭祀,是我国古代书院的三大功能之一,属于书院进行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祭祀活动的起源在于对孔子的仰慕,之后经过不断演变,成为对鸿儒先师或是对书院发展有重大贡献的人,或者是书院所在地区的圣贤名士崇拜追念的一项教育活动。位于保定安国市境内的贞文书院创建于明嘉靖十四年(1535),由时任祁州知州的孔天胤创设。该书院除了育人、研究及学术争鸣之外,崇祀宋代大儒祁州张子书院主讲张横渠(张载),又以明代本地及近郊状元董君章、李公平为配享对象。沧州的董子书院因为仰慕汉代大儒董仲舒而命名,院内供祀的正是古代思想家、教育家董仲舒。邯郸大名县境内的元城书院创办于明正德十五年(1520),康熙十年(1671)更名为天雄书院,是清初河北屈指可数的书院之一。书院主要供祀著名儒师、元城学派中枢刘安世,人称元城先生。有关该学派的内容及影响可见清代历史学家黄宗羲等著《宋元学案》卷20《永城学案》,此处不赘。书院的崇祀活动不仅对士子进行道德教育,而且也从感情层面上培养了他们对先圣先贤德业的崇敬与仰慕,加强了尊师重道的思想渗透及精神陶冶。通过祭祀圣哲的活动,使学子们耳濡目染,见贤思齐,以引导他们学习圣哲的道德品行、学识才智。

河北古代书院浓郁诚挚的师生情感,可以从其他案例或情景中获得印证。光绪三年(1877),保定莲池书院主讲者、新城(今属保定高碑店市)王振刚卒于书院返葬故里,“门人致哀麻治丧事,男、妇哀号奔赴,葬期不约而会者数千人”^[17]。王振刚与学生师生关系之融洽程度从学生治丧送行的场景中窥见一斑。乾隆十六年(1751)知县袁炳修于邢台南官市创建东阳书院,办学活动中十分关心爱护学生,“会课生童茶水,着看守书院人伺候,每课给予京钱一千文,以作茶叶、煤炭、甜水工费”。书院对学生的照顾体贴入微,使得学生在书院求学倍感温暖。又如保定莲池书院主讲、贵州文史名家黄彭年为自己的学生孙彦三写的哀辞提到“同道有朋兮,风义相敦”之句,可以看出在书院办学中教师和学生之间相处和谐,感情深厚。

2. 师生平等,教学相长

师生关系的平等主要体现在身份地位及学术上是平等的,师生之间往往会因为学术看法的不同而相互争辩探讨,“教学相长”是书院教育活动一直贯彻的思想理念。在教师和学生教学与学习的双边活动过程中,尽管教师是以教育行为发生及组织、评估主导者的角色而存在,学生处于成长发展过程不断成熟、完善的人生特定阶段,但教师在向学生传道授业的过程中师生彼此协作,发挥出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作用。教师在对发挥引导作用的同时,学生也对教师发挥反作用,这就是教师与学生教学相长的规律。

颜元在邯郸市肥乡县漳南书院实行分斋教学时要求他的学生之间必须“同学善则相劝,过则相警。即师之言行起居有失,俱许直言,师自虚受”^{[18]647-648},而如果为师者“言行有失生也可以直言相谏,而师自虚受”。颜元对他的许多弟子和朋友常会“虚心延访,互助师友”,“劝善规过”,学生们“颇咀学习乐味”。师生间融洽的教学氛围可启发学生,使师生敞开心扉、交流共鸣。在此,颜元并不是以绝对权威的

形象出现的,而是以一种亦师亦友的身份和学生相处,形成了自由、和悦的学习风气。除此之外,书院的教学方法并不是以教师为中心,而是教师注重学生个性、兴趣的培养;教师主讲,师生共同参与,在相互探讨、平等交流、对话沟通氛围下开展教学,并且注重开展健康有益的课外活动。颜元认为教育应该根据学生的特长与个性特征进行,“尽其性”而“学以致之”,则“气质”之“全”,可以学为通儒式的“圣贤”;若使“偏胜”之“气质”尽能获得合理教育,得到正常的发展,亦可以成长为专才中的“圣贤”,“全体者为全体之圣贤,偏胜者为偏至之圣贤,下至椿津之友恭、牛宏之宽恕,皆不可谓非一节之圣”。而“宋儒乃以偏为恶,不知偏不引蔽,偏亦善也。未可以引蔽之偏诬偏也”^{[19]31}。颜元在这里承认人的素质有“差等”“偏全”,即肯定学生个性差异的存在。教学应注重学生个性心理及能力程度的差异及特点,才能长善救失,使学生的成长与发展富有丰富性和卓越性。

3. 学术自由,注重研讨

与官学相比,书院无论是官办的还是私立的,其学术自由的思想氛围都比较浓厚,学生可以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提出不同见解而没有太多的心性压抑或精神约束。因此,在书院讲学者,相比于官学或者其他类型学校教师所负荷的心理压力较轻。学者名儒或淡泊名利之士,或讲求修身之法的儒学者,都愿意到书院讲学。以唐山遵化县燕山书院为例,该书院由时任永平府(今秦皇岛卢龙县)遵化州知州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创设至光绪初年达到办学高潮。书院独立规章,按章做事,在院长选聘、生童请假、酗酒赌钱以及考课蒙混等方面,官说滥荐及名实不符、形同虚设或放任自流等方式丝毫不予采用,并以此为耻,若有发现则惩戒不贷。在科举应试的重要维度参照的背景下,讲学内容的组织发挥也根据学者自身修养、兴趣喜好而有所灵活及弹性的设计,并无硬性、统一的要求,更不作严密的监督控制。明清时期虽然书院官学化加重,书院的教学内容、组织管理方式、方法及测评方案难免受到科举考试的制衡,但与官学相比,上述种种还是有一定的自主性。

古代河北书院在教学方法上,大多以学生自主读书、刻苦钻研为主,教师辅之以启发诱导,重视师生之间的互动交流。书院的学生绝大多数时间都是由自己阅读及探究,教师则是一个领路人,充当答疑或讨论、咨询者的角色,对学生读书、修身进行多方面指导。这样的做法并不是意味着书院教学松懈,只是通过教师的活动重在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刻苦钻研精神。明代嘉靖十六年(1537)创建的沧州泊头董子书院,倡导学生自主研讨,“次第请疑,问至即答”。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通过相互讨论的形式,提倡学生独立研究,具有探究性教学的思想因子,有助于发展学生的主体性及自主分析能力^{[4]535}。保定莲池书院教学组织形式多种多样。有教师的“升堂讲说”和生徒个人的“读书”“作业”与“自修”;有教师和学生之间互动“质疑问难”;也有游览于山石林泉与考察名山大川的户外教学活动;还有定期或不定期对学进行的课试、考核。由此可见,书院的教学活动在以学生自我进修为主的同时,仍在教师教诲和组织引导之下有序进行。

古代河北书院的教育及管理中存在着诸多独特之处,其间所产生的书院教育与管理文化值得我们目前教育管理者珍视。尤其是其中师生感情的深厚程度,不仅是同期的官学无法比拟的,就是当下的学校教育也有不及之处。当代社会随着社会工商业竞争的加剧以及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师生之间的感情呈现出淡漠化、利益化、冲突化的弊端,更甚者因师生关系恶化而出现校园极端暴力事件,让人痛心疾首、惋惜哀叹。古代的书院教育虽然是在农业与手工业经济为主导的宗法制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属于传统教育的一部分,其间也渗透着封建教育的伦理道德内容及要求,但是在教师选择、学生录用、学习指导等诸多方面的主张及实践活动,体现了教育合作、优化教学以及良好师生关系的理念、机制或文化内容。同时,上述思想主张也是人文主义教育管理经验在教师与学生方面的鲜活样本,值得当今教育管理者 and 广大教师借鉴和汲取。

参考文献:

- [1]顾明远.中国教育大系·历代教育名人志[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 [2]安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安新县志[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
- [3]安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安国县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6.
- [4]河北省泊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泊头市志[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
- [5]伊承熙,张震科.中国地方志丛书·河北省·宁晋县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1928.
- [6]陈美健.莲池书院[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
- [7]行唐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行唐县志[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
- [8]张彦娟,赵敏.河北教育史上的名山——封龙山[J].河北教育,2005(2):42.
- [9]宋濂.元史·选举制[M].北京:中华书局,1976.
- [10]王肇晋.(咸丰)深泽县志·卷8“人物志”[O].清咸丰三年(1853年)刻本.
- [11]张鸣岐.辽金元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 [12]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上册[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 [13]季啸风.中国书院辞典[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
- [14]韩志超,张瑜.中国地方志丛书·河北省·蠡县志·卷3“书院志”[O].清光绪二年(1876年)刻本.
- [15]吴洪成.河北书院史研究[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
- [16]王兰荫.河北省书院志初稿[M].北京: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出版社,1936.
- [17]黄彭年.畿辅通志·卷231[O].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刻本.
- [18]李焘.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上[M]//陈山榜,邓子平.颜李学派文库(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
- [19]颜元.存性编:卷二[M]//陈山榜,邓子平.颜李学派文库(一).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

Exploration of the Features of Ancient Hebei Academy

Wu Hongcheng, Zhou Xuan

(College of Education,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2, China)

Abstract: The academy is a unique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 in the form of ancient China, which has played a catalytic role on Chinese academic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personnel training from the Tang Dynasty to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Ancient Hebei Academy had the tradition of hiring teachers, while initial enrollment target expanded from easing to qualified random level requirements. Academy formed harmonious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which had features such as equality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teaching benefits teachers as well as students, academic freedom, research-oriented. The educational tradition of excellence provide reference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activities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today's schools, especially in shap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Key words: ancient times; Hebei academy; teachers; students;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责任编辑 石丽娟)